

为解决包钢能源及原材料供应问题,1958年10月,国家煤炭部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决定把乌海定为包钢的焦煤生产基地,进行重点开发,从全国十多个老矿抽调、派遣大批工程技术人员、管理干部、技术工人来到苍茫戈壁,在黄河两岸的乌达和海勃湾地区同时开展大规模的生产建设活动,拉开了堪称乌海历史上开天辟地的——

万人上山夺煤大会战 (上)

本报记者 韩建慧

一处处建设工地塔吊林立,一座座现代化厂房拔地而起,一条条厂区道路铺展延伸,特色鲜明的产业集群蓄势待发……时维盛夏,乌海处处涌动着热火朝天、大干快上的建设热潮。

创新是最好的传承。这样澎湃而热烈的生产建设场景,似乎从未因光阴流逝而改变。一个甲子前,乌海大地亦曾展示过这样宏伟壮阔的一幕。

1958年,为解决包钢建设之初遇到的原材料困难,来自祖国五湖四海千千万万的劳动者,在无水、无电、无房的情况下,在戈壁荒野中艰苦创业,将优质的焦煤资源源源不断地运到包钢,为新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也谱写出一部各民族儿女

一起来过,一起走过,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壮美史诗。

历史前行的每一步,都需要精神的滋养;

风雨无阻的每一程,都饱含精神的磨砺。

2021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特别提到了“齐心协力建包钢”的历史佳话。今天,让我们重温这段艰辛与荣光并存的辉煌过往,从自治区重大工程(项目)典型事迹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用红色引擎砥砺我们开拓前行的信心和勇气,奋勇向前,在努力完成好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中扛重任、担重责,在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的生动实践中展风采、作贡献。

贺兰山下英雄谱 长河万里佳话传

乌海,九曲黄河流过的地方,太阳神闪耀的地方,四合木生长的地方,一代天骄走过的地方。

这片土地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早在清朝末年便为世人所知,但对于乌海地区矿产的勘测却始于新中国成立后的1953年。这一年,华北地质局桌子山普查队对桌子山地貌进行了全面普查,对桌子山地区煤田的分布情况、煤质、成因、储量和今后勘探类型,作了初步结论及远景评价。

1954年,华北地质局205勘探队、内蒙古147煤田勘探队开进乌海地区,对桌子山煤田各矿区进行了更为全面的详查和精准勘探。1955年,国家煤炭部又派勘探小组对贺兰山北端、黄河两岸的煤田进行实地调查。同年底,煤炭部决定,建设由贺兰山北端、黄河两岸的桌子山、老石旦、公乌素、乌达等15个地区组成的西北煤炭基地。这一时期,国家107、703地质队也在乌海大地留下了足迹。

经过地质队员连续几年的勘查,基本查清了乌海地区两大煤田的矿产地质情况,于是,在1957年7月1日,《内蒙古日报》首次以“贺兰山下喜讯传”为题,报道了乌海地区的煤炭发展前景。地质勘查为大规模开发提供了科学依据,创造了基础条件,也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

1958年2月7日,中共巴盟盟委正式批复中共地方国营乌达煤矿委员会成立;10月,中共乌达煤矿临时委员会成立;同年10月,“桌子山矿务局筹备处”也在卡布其正式成立。这样,伴随着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步伐,乌海地区这片亘古荒原迎来了改天换地的隆隆春雷之声。

老一代人回忆,1958年,与乌海矿区开发有直接联系的两个重点项目——兴建包头钢铁公司和修筑包兰铁路线都已基本完成。

被称为西北大动脉的包兰铁路由当时矿区中部通过,距矿区最近的三道坎车站东去包头405公里,西南方向去兰州为595公里,其中包(头)银(川)段铁路已于1958年7月实现通车,为矿区的开发及煤炭外运创造了条件。

见证着共和国工业发展的包头钢铁公司也正处于大规模建设时期,人们热切期望的一号高炉建设却遇到了设备和建设材料供应不足难题。

为满足社会主义工业化

建设对煤炭能源的迫切需要,原国家煤炭部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决定大力开发建设西北地区重要的焦煤基地。

1958年10月17日,根据自治区党委召开的西部地区盟市委书记会议精神,乌海地区开始了万人上山夺煤大会战。乌达、海勃湾地区同时开启万人上山夺煤大会战的主战场,自治区派来大批干部筹建乌达矿务局、桌子山矿务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管理干部、技术工人从大同、开滦、抚顺、鸡西、井陘、峰峰、鹤岗、包头、扎赉诺尔、四龙头沟等10多个老矿区涌到乌海煤田,支援开发建设,拉开了乌海地区大规模开发建设的序幕。

如果以今天的眼光来看,1958年,发生在乌海这片土地上的万人上山也许算不上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在新中国成立70多年的历程中,经济建设中所经历过的“大手笔”比比皆是:三峡工程、青藏铁路、西气东输、南水北调……无不堪称惊世之作。

然而回望来时路,你就会发现,1958年对于乌海来说,绝对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座丰碑,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这座城市的面貌和命运。

在夺煤大会战中,上万名党员干部、工人克服重重困难,艰苦奋斗,表现出非凡的创造力和英雄气概,生产连创佳绩。到1958年年底,乌达矿区开挖小煤窑42座、小露天煤矿1处,全年共生产煤炭84.48万吨;桌子山矿区开挖小煤窑100多个,小露天煤矿10处,生产原煤55.5万吨,炼焦炭4万吨,均超额完成了自治区下达的全年生产任务。

这一段历程注定要在乌海的发展建设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回忆。

从这一年开始,乌海正式启航,在滚滚历史洪流中乘风破浪,直挂云帆济沧海。

大漠雄风催战鼓 立马乌达壮歌行

1958年的隆隆炮声惊醒了黄河两岸古老的土地。在之后一个甲子的时光里,我们始终怀念当年父辈们展现出来的英雄气概。

彼时作为“万人上山夺煤大会战”的主战场之一的乌达煤田,戈壁黄沙绵延,没有住房、没有饮水、没有供电、没有蔬菜,生活中所需要的一切几乎没有,而时间却已临近冬季,短时间云集的各路生产大军遇到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

首先亟待解决的就是住房问题。据资料记载,1958年10月,整个乌达矿区仅有80多间破旧的小土房,短时间云集的上万建设大军住在哪里成了当时的第一大难题。经过讨论后,大家决定,先就地挖窑、支帐篷、盖一些石头房,以此应付即将到来的严冬。冬季过后,还可以搭草棚、架帐篷、干打垒、砌石屋,以解决居住的问题。

王海潮就是曾经的亲历者之一。1958年,作为支援乌达煤矿开发建设青年突击队中的一员,20多岁的他背着一袋干粮和一卷铺盖从巴盟来到乌达,一下车他就惊呆了,四野茫茫、荒山秃岭,放下行李的第一件事就是挖地窖子。

王海潮和几个工友,在小煤窑旁选了一个避风的斜坡,沿着水平方向挖上数米,搭上檩条、笆子,再用板

皮钉个门,这就是他的第一处住所。没有床,工友们搬来厚厚的麦草铺在地上,当夜刮了一夜风,第二天睁开眼,他的被子上蒙了厚厚的一层沙,就像刚从土堆里爬出来似的。

从唐山开滦煤矿来支边的冯秀英夫妻也曾给记者讲述过这一段过程。当时,夫妻俩全部的家当就是两卷铺盖一口锅,来乌达的路上还曾嫌这口锅碍事,差点儿就丢在了半路上,谁料到了地方才知道,有这么一口锅是多大的运气。“吃饭、烧水洗脸都靠它。住在地窖子里的时候,就把这口锅立在门口挡沙子,一夜过去,半锅黄土。”她说。

除了没有住宿条件,生活物资也非常匮乏。王海潮还记得他到矿区吃的第一顿饭。“热气腾腾的玉米糊糊和窝窝头出了锅,但我没有碗,走了半个营区,借了一个水瓢盛糊糊,然后摘下帽子,用帽壳装了3个窝窝头。”他说。

草为褥,沙当床,挖个地窖就是房。即便是这样,与王海潮、冯秀英一样的人们还是选择了留下来,他们努力适应环境,边生产边想办法改善居住条件。与此同时,矿区筹备处也积极解决职工的住房问题,分别在巴音赛、教子沟、梁家沟、苏海图等多处选址规划,组织多支施工队同时施工,曾创造了每天交付一栋房的建设速度。

随着人口越来越多,吃水问题也成了燃眉之急。混浊的黄河水是当时矿区职工们唯一的水源。最初,乌达煤矿从矿上抽出几辆毛驴车和一辆汽车,专门到十多公里外的黄河拉水。

因为水实在太珍贵,澄清了的黄河水只舍得做饭用。爱美的女性也不舍得用水来洗脸。“十天难洗两回脸,两月不洗一回衣,不是大家不爱讲卫生,实在是用水太艰难了。”亲历过这一段过程的冯秀英说。

1959年10月,水文地质工作者在距乌达矿区6公里的牛根沟内打出了一口试验井,发现离地表30米处有一个含水层,这里的水可以供人饮用。时任矿区筹备处领导的张学儒当即组织两个单位的职工协作作战,在10月16日当天就完成了3间水泵房的土建工程和柴油发电机及水泵的安装调试工作。

由于当时没有电话,人们约定在水泵房旁边竖起高高的桩子来传递信号。如果红灯闪烁,就意味着工程完工。那一晚,当人们远远看到红灯闪烁时,都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此后,乌达矿区在年内又新建了3处加压泵房,在各中心工人村砌筑了集中饮用水池,铺设管路把水送到各矿和各工人村,这才初步解决了生产和生活用水紧张的问题。

荒山野岭建矿区,缺电是建设者遇到的另一重大难题。在井下,工人靠明火照明生产,十分危险;在井上,一旦天黑,就只能提着煤油灯办公、开会和学习。到了休息时间,则只能靠天上的星星和月亮来照亮。

1958年4月,乌达煤矿筹备处在梁家沟使用一台6千瓦柴油机发电,仅用于照明;1958年12月中旬,解放军铁道兵部队将一台建造乌达黄河铁路桥时使用的30千瓦柴油发电机组赠送给乌达煤矿,电灯的光芒第一次照亮古老沙漠的夜空。

几个月后,矿区又拥有了一台旧式500马力柴油发电机,同时,高压线已通向一矿、二矿和三矿,部分矿区使用电力生产。为进一步彻底解决乌达电力供应问题,自治区原电力工业局增派技术人员,全力加快1500千瓦捷克快装燃煤发电机的安装调试工作。1959年7月25日,这台当时此地区最大的发电机组正式向矿区供电,发电能力提高了4倍。1960年7月12日,由原国家经委和水利电力部协调,将全国编号为第

37号的列车电站调到乌达矿务局,并于1960年8月2日成功实现并网运行。由此,局自备电厂的装机容量达到4000千瓦,成为自治区的第三大电厂,解决了建矿初期的电力供应问题。

“有了电,一切都好起来了。”已故的建设者陈学良老人曾这样感慨地说,“上班辛苦啊,但人们干劲儿足啊!有了电,矿上组织了扫盲班,晚上下班都能跟着学文化。”

当时,困扰人们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吃菜问题。1958年以前的乌海地区,到处是沙漠戈壁、荒山秃岭,乌达矿区更是沟壑纵横、石砾遍地,“地上不长草,天上无飞鸟,风刮沙石满地跑”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王世明老人1959年从北大荒来到乌达支边,他至今还记得,当时的乌达矿区,几十里没有一棵树,更没有一块绿地。吃菜要靠外地支援,人多菜少,即便是冻土豆,也不能保证大家都能吃得到。

由于长时间吃不到新鲜蔬菜,必需的副食品也少得可怜,加上粮食定量不足,职工的体质明显下降,许多人患上了浮肿病。为了缓解吃菜难,春季时大家就利用工休时间,成群结队到野外挖苦菜、拔沙葱,采掘各种能吃的野菜。

1959年春天,原乌达矿务局党委副书记武政展带领十几名职工家属,开进了风沙弥漫的黄河西岸。

他们在茫茫戈壁上,打下了第一根桩柱,画上了第一条渠线。用铁锹、镐头和担筐,平整了一个个沙丘,开垦出第一块农田,种上了第一片蔬菜,矿区农林业开发建设就此拉开序幕。

1960年10月,乌达矿务局农场正式成立,矿区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地开荒种地,各矿相继成立了农业生产管理区。昔日一块块寸草不生的戈壁荒滩,被开垦成林地良田,种上了多种蔬菜和庄稼。与此同时,林业工程师傅生德在新建的矿务局院内,栽下了乌达的第一片树,荒漠终于绽现出喜人的绿色。

84岁的老人孟顺琴就是当时二矿管理区的一员,回忆起当年在管理区种菜的经历,她仍然感慨万千。那时候荒滩野地里种菜全靠人工挖毛渠、打围堰,可是刚打好,第二天就被沙子填平了。蔬菜秧苗更可怜,种下去不是被刮走,就是因为沙子太厚顶不出芽来。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聪明的开荒者想出了“盖窝窝”和“挂门帘”的办法。所谓“盖窝窝”就是用黄土捏成泥窝窝,刮风的时候就一个一个扣在小菜苗上;“挂门帘”则是在菜地的向阳侧挖出一个小窖,把菜苗种在窖里,外侧挂一块塑料膜,等这些菜苗逐渐茁壮起来,再把小窖铲平。

他们趴在“地窝子”里精心地伺候每一株秧苗,风来了就赶紧挡,没有水就深挖渠,然后担水来浇,一副担子四五十斤重,身高一米五的女人也能担几个来回,就这样,每年竟也能丰收,解决了矿区职工吃菜难的问题。

随着生产建设的迅速发展,矿区职工生活福利、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和其他社会事业也相应起步。矿务局陆续建起中学、小学和矿区医院;各矿陆续建起职工澡堂、食堂和职工宿舍,部分矿工迁入新居,集中居住的工人村还兴建了俱乐部。同时,粮油供应站、防疫站、百货商店、邮电通讯纷纷落户,至1960年底,塞外煤城已现雏形。

铁路勘线

与包兰铁路相连的矿区运煤专线

荒原取水

